

中原北望气如山

► 观察能力篇 ◀

天空偶尔飘过朵流云，一颗石子倏地投入了波心。生活中泛起的无数涟漪，恰是产生美文的根源。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写下了这样的理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一直是中国文人写作的立足点。描摹只是初级观察的结果，在本单元中，我们将跨越历史与空间界限，畅游于大师的视野之内，让他们引领我们“向着青草更青处漫溯”。我们会看到：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眼前的树匆匆走过，当雪花在天空中绽放的瞬间，人与树无缝隙地契合了；周作人于北京茶食中提取出历史的精炼或颓废；温亚军等人的笔下的现实，或沉重，或轻盈，或狂野，或沉静；萨特和蒲宁两位文豪的游记，也寄存了彼此不同的心绪和希望……



山西尹壁北原中

本篇能力点

多角度观察 细节观察

女性观察

跟踪观察

幻觉观察

历史观察

心态体验感觉

时代观察 以意逆志

科学历史观察

比较观察

多元观察

宇宙观察 宇宙意识

听觉观察

能力点 多角度观察 细节观察

纪念胡乔木文章两篇

怀念乔木

柴季菱林

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决不是的。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木(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十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胡乔木

等到我于一九四六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从南海寄出来的信。信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志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一九五一年,我国政府派出了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胡乔木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

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是狂狷，我也只当秋风过耳边。

但是，乔木却决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有独自的经历。我们虽然没有当面谈过，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

一九八六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人，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倒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他请我吃午饭。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非薄，与一般人想像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也就一清二楚了。

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我委婉地回绝了,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人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还是老实实在地呆在家里为好。

最近几年以来,乔木的怀旧之情好像愈加浓烈。他曾几次对我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我真是有点惊讶。我比他长一岁,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哩。但是,我似乎能了解他的心情。有一天,他来北大参加一个什么展览会。散会后,我特意陪他到燕南园去看清华老同学林庚。从那里打电话给吴组缃,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乔木告诉我,在清华时,他俩曾共同参加了一个地下革命组织,很想见组缃一面,竟不能如愿,言下极为快快。我心里想:这次不行,下次再见嘛。焉知下次竟没有出现。乔木同组缃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就离开了人间。这也可以说是抱恨终天吧。难道当时乔木已经有了什么预感吗?

他最后一次到我家来,是老伴谷羽同志陪他来的。我的儿子也来了。后来谷羽和我的儿子到楼外同秘书和司机去闲聊,屋里只剩下了我同乔木两人。我一下回忆起几年前在中南海的会面。同一会面,环境迥异。那一次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这一次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乔木仍然用他那缓慢低沉的声调说着话。我感谢他签名送给我的诗集和文集。他赞扬我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我顿时感到惶恐,赧赧不安。我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他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谈话时间不短了,话好像是还没有说完。他终于起身告辞。我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我哪里会想到,这竟是乔木最后一次到我家里来呢?

大概是在前年,我忽然听说:乔木患了不治之症。我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万一。这一次,我真想破例,主动到他家去看望他。但是,儿子告诉我,乔木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去看他。我只好服从他的安排。要说心里不惦念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六十多年的老友,世上没有几个了。

时间也就这样过去,去年八九月间,他委托他的老伴告诉我的儿子,要我到

医院里去看他。我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同我最后诀别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到了他住的医院里。病房同中南海他的住房同样宽敞高大，但我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那一次进中南海相比，我这一次是来同老友诀别的。乔木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还有一些点滴用的器械。他看到我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看来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友的手了。但是，他神态是安详的，神志是清明的，一点没有痛苦的表情。他仍然同平常一样慢声慢气地说着话。他曾在《人物》杂志上读过我那《留德十年》的一些篇章，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又忽然想了起来，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我此时此刻百感交集，我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我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这种空洞萦绕在我耳旁，使我自己都毛骨悚然。然而我不说这个又能说些什么呢？

这是我同乔木最后一次见面。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了人间。按照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做法，《留德十年》出版以后，我应当到他的坟上焚烧一本，算是送给他那在天之灵。然而，遵照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已撒到他革命的地方了，连一个骨灰盒都没有留下。他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然而，对我这后死者来说，却是极难排遣的。我面对这一本小书，泪眼模糊，魂断神销。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现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牛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这就难说是好是坏了。

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人间，后死者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何况我又是一个感情常常超过需要的

人,我心里这一份负担就显得更重。乔木的死,无疑又在我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我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份负担呢?我自己说不出。我怅望窗外皑皑的白雪,我想得很远,很远。

1993年11月28日凌晨

不成样子的怀念 ——我所认识的胡乔木

王 蒙

一九九二年秋,我结束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参加华拉纳节作家周的活动,应艺术理事会的邀请转赴悉尼。到悉尼的第一天,得悉了胡乔木同志逝世的消息,当即给他的遗属拍去了唁电。

对某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我的反应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因为,他们习惯于以“保守派”与“改革派”、“强硬派”(或鹰派)与“温和派”(或鸽派)、“正统派”与“自由派”的两分法来划分中国的一些人士。这种简单化的划分,实在与“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无二致。同样的简明,同样的粗糙,有时候是同样正确,有时候又是同样荒谬。按照这种粗糙并有时荒谬的“两分法”和角色的派定,王某人不应该与胡常委(他逝世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顾委常委)相互友好。

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接到了乔木同志来信,信上说他在病中读到了我的近作(看样子他读的是人民大学编印的《王蒙小说创作资料》,一本以教学参考资料为名广为行销的“盗版”书籍),他对之很欣赏。他写了一首五律赠我,表达他阅读的兴奋心情。

不久我们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衰弱,说话“底气”不足,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他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与一味的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 yún 而不是像许多人读成 jū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他也讲到,马、恩等虽然有很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对于文艺问题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没有专门地系统地去论述文艺问题,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严整

的文艺学体系。他说：“我这样说，也许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可惜，也许是顾虑于“大逆不道”的指责，人们未能见到乔公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吸收了 this 思想。虽然，这篇文章使一些人至今如芒刺在背而难以释然。

我举例问到了关于对毕加索的评价，我想知道他个人是否欣赏毕加索，我也想知道在中国，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他的回答出我意料，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还难于接受毕加索。”我以为他的回答流露着某种苦涩，也许这种苦涩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觉造成的。

我问他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他说典型是外来语，然后他讲了英语 stereotype，他说这本来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他发挥说，如说高尔基的《母亲》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不是《母亲》，而是《克里木·萨木金的一生》。然后他如数家珍地谈这部长而且怪的、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使我大吃一惊。

其后不久乔公对于《当代文艺思潮》上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大发雷霆，于是我看到了此老的另一面。他认为徐的文章是对于革命文艺的否定，认为《思潮》这本刊物倾向不好。他甚至于不准旁人称徐为“同志”，这使我觉得他处理问题有时感情用事。我告诉他，《思潮》的主编是一位“好同志”，这位同志曾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做文字工作等等。乔木的反应是：“那就更荒诞了！”随后，他谈此杂志时的调门略降低了一些。

一九八三年春节我给他拜年，他读了我的小说《布礼》，认定我的爱人一定极好，便责怪我为什么不带爱人来，并且立即命令派车去接。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文艺报》等展开对“现代派”的批判，高行健的一本小书与冯骥才、刘心武、李陀与我的致高行健的信使《文艺报》等如临大敌。一位日丹诺夫主义的中国传人理论家在会议上大讲“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位负责人也郑重其事地大讲“批现代派的政策界限”，令“犯了事”的作家紧张莫名。连他的亲属也上了阵，讲“党的十二大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 they 要搞‘现代派’！”

乔木同志当时在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然熟知这些情况，更知道批“现代派”中“批王”的潜台词和主攻目标。一九八三年春节他对我一再说：

“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

这一点也很有胡乔木的风格，他要批“现代派”，或不能不首肯批“现代派”，他也要保护乃至支持王蒙，鱼与熊掌，兼得。

这一次会面起到了他所希望起的那种作用。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批王”的雄心壮志。

胡乔木对张洁的小说与生活也很关切。他知悉张洁婚姻生活的波折与面临的麻烦，他关心她，同情她，并且表示极愿意帮助她。

另一个女作家引起胡关注的是冯宗璞。他读了冯在报上发表的《哭小弟》：宗璞的弟弟是搞尖端科学的，英年早逝。当时中央正在抓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与政策落实问题。胡说他读了《哭小弟》给作者写了信。我向他介绍了冯的家学渊源。他后来又接触了一些冯的作品，颇赞赏。胡的艺术趣味偏于雅致高洁，与宗璞对路。他曾经激赏过我的小说《歌神》，却接受不了我的幽默、调侃，也是一证。有一位革命文艺批判家权威，一提起宗璞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位权威主要是厌恶宗璞的书卷气与学府生活。比较一下他和乔木的态度，令人叹息。

说到个人爱好，胡喜欢黄自和贺绿汀，把一盒复制的黄自歌曲磁带赠送给了我。并批评音乐界的“门户之见”。胡喜欢看芭蕾舞，并向我建议请舞蹈团以抗震救灾为题材搞一个舞剧。胡的欣赏品味是高的，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罪过！

与此同时，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一九八一年，我的小说《杂色》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辞。他又把一期载有高尔斯华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的《江南》杂志寄给我，该文的主旨似亦在主张“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要太“现代派”。我想，这对于一心追新逐异的浅尝者们，还是有教益的。

我曾与周扬同志谈起乔木的这番意思。周立即表示了与胡针锋相对的意见。周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对于周，我理应在今后写更多的回忆文字。

胡乔木还曾托付一位与我们都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我毫不怀疑他意在“爱护”，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

此后由于我也忝列于某些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层”之中，便与胡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交流与碰撞。一九八五年，作协“四代会”开过，胡一次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对无条件地提倡“创作自由”的文章作为《文艺报》的社论发表。此次，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舒婷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他未能在政治与文艺思想方面对舒产生多少影响，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甚至于主观地认为，他的“失败”论是一种防护姿态，以免因这一拜访受到某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指责。八十年代以来，舒婷亦多次受到批评，以“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朦胧”为由批判“朦胧诗”，与前述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由批“现代派”逻辑一致，语言一致，版权归属一致。

据说，胡对于舒婷是很友好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诗（指舒诗）还看不懂，那就只能读胡适的《尝试集》了。”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诗心相通，谈何容易？

一九八五年这一次，胡向我表示：“我很担忧，今后像《北国草》（从维熙作品——王注）、《青春万岁》这样的作品没有人写了。”他还表示既赞赏陆文夫、邓友梅的作品又感到不满足。

我接到胡派下来的文章，便与作协诸新老领导共同研究，并组织力量对文章进行了某些增加“防震橡皮垫”型的修改。我总是致力于使上面派下来的提法更合理也更容易接受些。也许我常常抹稀泥，但我仍然认为抹稀泥比剑拔弩张和动不动“断裂”可取。修改稿胡看后表示“佩服”，以编辑部文章名义发了出去。胡于是直接下令包括《文学评论》与《当代文艺思潮》在内的几个刊物限期转载。

他的作法引起了一些议论。于是朱厚泽（当时任中宣部长）、邓友梅（作协书记之一）和我到正在住院的乔木同志处。我反映了一些意见，胡略有些激动，他说：“作家敏感，我也敏感！”

我谈到那年的一匹“黑马”，到处讲胡要对王蒙如何如何下手。他更激动了，他甚至说：“我怎么可能打倒王蒙？我如果去打倒王蒙，那就像苏联的（政治笑话所描写的那样——王加注）赫鲁晓夫去打倒斯大林，斯大林倒了，也把他自己压倒了……”

他有点拟喻不伦，但也说明他情真意切。这也许透露了他的“一本难念的

经”，也许还含有对我当时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态势的讽刺，谁知道呢？

这次见面中邓友梅讲了一些对浩然和有关现象的看法，胡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他表示十分反感。他愤然说，是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浩然新作《苍生》出版的消息。提起浩然他也充满友善。我于是告诉了他北京中青年作家对浩的友好态度和一些事实，当然，说的是浩然流年不利那几年。他笑了。

和他接触多了，我有时感到他的天真。虽然他是老革命老前辈，虽然他饱经政治风雨特别是党的上层沧桑，但我很难判断他是否人世很深，城府很深。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他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反而失去了沉入社会底层，与三教九流、黑白两道打交道混生活的机会，他当然很重视他的权力与地位，他也很重视表现他的智识（不仅是知识）和才华，以及他的人情味。这种表演有时候非常精彩，以致于我相信他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乔公是不二的人物。有时候又十分拙劣，例如自己刚这样说了又那样说，乃至贻笑大方。一九八三年他批了周扬又赠诗给周扬，他的这一举动使他两面不讨好，这才是胡乔木。只谈一面，当不是胡的真人。

胡乔木很喜欢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乐于为知识分子做一些好事。他与钱钟书的交往许多人都是知道的。为了“帮助”我不要走“现代派”的“邪路”上越走越远，他建议我去请教钱先生，并说要代为荐介。我觉得由胡介绍我去拜见钱，有点“不像”，便未置词。

胡对赵元任先生的尊重是公开报道过的。

胡对季羨林、任继愈都极具好感。任继愈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就是胡乔木提名的。他曾向我称道金克木、王干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年轻的王干，竟是乔木说了以后我才知道，并相识交往了的。那年宗璞患病，住院住不进去，我找了他的秘书，胡立即通过当时的卫生部长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于电影《芙蓉镇》的挽救。由于一九八七年初的政治气候，有一两位老同志对于《芙蓉镇》电影猛烈抨击，把这部影片往什么什么“化”上拉。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芙蓉镇》辩护！”他的语调里颇有几分抱打不平的英雄气概。

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芙蓉镇》公演了。

从这里我又想起胡为刘晓庆辩护的故事，刘晓庆发表自传《我的路》以后，

电影界一些头面人物颇不以晓庆的少年气盛为然,已经并正在对之进行批评,后被胡劝止。

我又想起他对电影《黄土地》的态度。他肯定这部片子,为它说过话。胡做过许多好事,例如他对于聂绀弩的诗集的支持。胡做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挨骂”的事他却大张旗鼓。这也是“政治需要”吗?这需要有人出来说明真相,我以为。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十月我们相见,他很紧张,叫着秘书作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谈了一会儿,见我心平气和,循规蹈矩,一如既往,并无充当什么角色之意,他旋即转忧为喜,转“危”为安,又友好起来,面部表情也松弛了许多。

不久,他约我一起去看望冰心为之祝九旬大寿。他还要我约瞿希贤作曲家与李泽厚一起去。后因瞿当时不在京,李也没找到,未成。我则去了冰心老人那里。他写了一幅字,四言诗给冰心,称冰心为“文坛祖母”。然后又与冰心留影,又是与我照相。他还讲起他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搞学术而被卷到政治里的,不可随便点名云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这位老人见面了。后来他寄来了他签名的诗集。

他大概仍然想保护一些人。但是这次已不是一九八二年或者一九八三年。他本人也处于几位文坛批判家的火力之下。在一次“点火”的会议上,几个人已经用“大秦斗保护小秦斗”这样的说法攻击乔木。也有的人干脆点出了乔木的名。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他极力向批他的人套近乎,说了许多未必得体的话,但反应冷淡。据说还向另一位曾撰文委婉批评他的人大讲王蒙的“稀粥”写得如何之不好。我觉得他已经为与王蒙拉开距离做了铺垫。这与他的与我讲看访舒婷“失败”具有相近似含义。他的这些努力都引起了一些说法,而且,反正他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越来越式微了。

在这篇不成样子的怀念文章最后,我想起了一九八八年他的一次谈话。当时中央正准备搞一个文件,就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提出一些方针原则。就此文件草稿,有关同志送他征求意见。他对我说:“要把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惨痛教训,郑重总结以昭示天下。”他说得很严肃,很沉痛,对于文件的要求也非常之

高。他慨叹党内缺少真正懂文艺的周恩来式的领导人。他要求回顾历史的经验，但他又说：“不要涉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最后这个意见，我传达给有关负责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无法照办。

乔木凋矣，但我没有也不会忘记他。我远远谈不上对他有多少了解。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也许我的体会感受有误。当然我写的只是我眼中的胡乔木。也许，一个更深沉、更真实、更完全也更政治的胡乔木，是我没有也无法把握的。但我仍然有义务把这一切写出来，为了怀念与对他的感激。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智慧点评]:胡乔木是我们国家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长期的主要领导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指导并参与了一些影响知识分子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因此也是一位众说纷纭的人物。这类是非毁誉加于一身的人，难写也更难写好。季羨林先生与王蒙先生都是与胡乔木有交往的人。两文也各自以自己的所闻所见来写，都写出了“我眼中的胡乔木”，颇具个性。胡乔木的生动形象也展现在人们面前。文章都写了作者对胡乔木的观察，描绘了交往中的一些细节，切近可感。文章没有概念化的语言，这也与塑造胡乔木平凡人性化的一面相统一。所不同的是，季文描写的胡乔木形象较为稳定统一，作者以自己的眼光看人，胡乔木始终是他真诚的朋友，因而情真意切；而王蒙文章则更突出了胡乔木作为身居高位的领导人的复杂性的一面，并由此讲述了处在政治与文艺夹缝中的人生的不易，因而感慨遥深。就散文艺术而言，对于大的事物或人物，从宏观上总体把握，一般来说比较困难。而两篇文章的作者都选准了突破口，捕捉住一些有意味的片断，写出了人物的风神，收“一叶知秋”之效。

提示 季羨林和王蒙笔下的胡乔木性格都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请尝试着写出某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你认为本篇文章适用的解读方法：_____

能力点 女性观察 细节观察

王瑶先生杂忆

梁赵 园

1989年岁末,随师母护送王瑶先生的骨灰回系后,理群兄来约写纪念先生的文字,我只觉得内心枯河般的,是洪水过后的一片沙碛。然而时间总能疗救创痛的。“回忆”亦如京城3月漫天黄尘中的新绿,渐渐又在心头滋生。关于先生,终于可以写稍多一点的文字了,虽然仍不能尽意。

先生于我,并非始终慈蔼。平原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先生对子女和弟子“从不讲客套”,“不只一个弟子被当面训哭”。我就曾经是被先生的威严震慑过的他的学生。1978年重返北大,先生的那一班研究生中,被他一再厉声训斥过的,我或许竟是惟一的一个。待到有可能去体会那严厉中包含的“溺爱”,已是我再次离开了北大之后。而在当时,却只是满心的委屈,还真为此痛哭过几回。直到毕业前,先生似乎都不能信任我组织



王瑶

“论文”的能力。有次在校园里遇到他,关于论文题目一时应答不好,竟被他斥责道:连题目都弄不好,还怎么做论文!那里正是北大后来颇有名的“三角地”,人来人往的所在。当时我必定神色仓惶,恨不能觅个地缝钻进去的吧。在护送先生骨灰回京的列车上,我才由闲谈中得知,先生当初是表示过决不招收女研究生的。我突然想到,那时的先生听别人说起我的委屈和眼泪,是否也为他终于收下了这个女弟子而后悔过的?

作为导师,先生自然有他的一套治学标准,有时在我看来近于刻板。比如他对“论文”规格的强调,我就并不佩服,以为太学院气了。因而即使在毕业之后,看到黄裳先生挖苦“论文”的文字,仍然忍不住兴冲冲地摘了来,嵌在自己论文集的后记里。然而我应当承认,先生的“那一套”,对于训练我的思维与文章组织,是大有益处的。毕业后继续这个方向上的自我训练,其成绩就是那本《艰

难的选择》这应是一本“献给”先生的书,虽然书上并没有这字样,甚至没有循惯例,请先生写一篇序。

我并不打算忏悔我对于先生的冒犯——那是有过的,在几经“革命”、破坏、古风荡然无存之后。我这里要说的是,即使时至今日,我也仍然不能心悦诚服于他震怒时的训斥。在我看来,这震怒有时实在不过出于名人、师长的病态自尊。先生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而他过分严格的师弟子界限,时面现出的家长态度,也不免于“旧式”“五四”一代以至“五四”后的知识分子,有时社会意识极新而伦理实践极旧,这现象一直令我好奇。因而在先生面前聆教时即不免会有几分不恭地想:我永远不要有这种老人式的威严。然而于今看来,如先生这样至死不昏愤,保持着思维活力和对于生活的敏感,又何尝容易做到!

正是在北大就读的最后一段时间及离开北大之后,我与我的同学们看到了这严于师生界限、有时不免于“旧式”的老人,怎样真诚地发展着又校正着自己的某些学术以及人事上的见解、看法。“活力”,即在这真正学者式的态度上。而严于师生分际的先生,对于后辈、弟子的成绩,决不吝于称许。毕业之后,我曾惭愧地听到他当众的夸赞,更听到他极口称赞我的同伴,几近不留余地。他一再地说钱理群讲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位老先生效果好,用了强烈的惊叹口吻;说到陈平原的旧学基础与治学前景时,也是一副毫不掩饰的得意神情。我从那近于天真的情态中读出的,是十足学者的坦诚。正是这可贵的学者风度、学人胸襟,对于现代文学界几代研究者和谐相处、共存互补格局的造成,为力甚巨。我相信,十余年间成长起来的“新人”,对此是怀着尤为深切的感激之情的。

我已记不大清楚是由什么时候起,在他面前渐渐松弛以至放肆起来的。对着不知深浅放言无忌的自己的学生,先生常常含着烟斗一脸的惊讶,偶尔喘着气评论几句,也有时喘过之后只磕去了烟灰而不置一辞。然而先生自己也像是渐渐忘却了师生分界,会很随便地谈及人事,甚至品藻人物,语含讥讽。他有他的偏见,成见,我不能苟同;行事上也会有孤行己意的固执。但我想,这也才是活人的爱恶吧。我还留心到即使在彼此放松、交谈渐入佳境后,先生也极少讥评同代学者,这又是他的一种谨慎,或曰“世故”。先生并不属于“通体透明”的一类——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过以及目下是否还会有这类人物。先生是有盔甲的。那俨乎其然的神气,有时即略近于盔甲。在一个阅历过如此人生,有过

这样的经历的人,这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先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毕竟又是他“丢盔卸甲”的那时刻。坦白地说,我乐于听先生品评人物,即因为当这时最能见先生本人的性情。而先生,即使有常人不可免的偏见,却更有常人所不能及的知人之明。记得某次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处在某种位置上,就免不了非议,并不一定非做了什么。我于是明白,对于先生,有些事,已无须乎解释了。还听说先生最后参加苏州会议期间,私下里谈到一位主持学术刊物编务的同行,说他“完成了他的人格”,在场者都叹为知言。据我所知,先生与那位同行,私交是极浅的。

常常就是这样,先生信意谈说着,其间也会有那样的时刻,话头突然顿住,于是我看到了眼神茫然的先生。我看不进那眼神深处,其间亘着的岁月与经验毕竟是不可能轻易跨越的。然而那只如电影放映中的断片。从我们走进客厅到起身离去,先生通常由语气迟滞到神采飞扬,最是兴致盎然时,却又到了非告辞不可的时候。我和丈夫拎起提包,面对他站着,他却依然陷在大沙发里,兴奋地说个不休。我看着他,想,先生其实是寂寞的。他需要热闹,尽兴地交谈,痛快淋漓地发挥他沉思世事的结论,他忍受不了冷落和凄清。天哪,“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日子,这位老人是怎样熬过来的!

“文革”中先生处境极狼狈时,我曾一度和他在一起。那已是“清队”时期,教员被分在学生班上,甚至住进过学生宿舍。他即在我所在的文二(三)班,北大中文系有名的“痞子班”——“痞子”二字,是当年被我们洋洋得意地挂在口头的。我目睹过对先生的羞辱,听到过他“悔罪”的发言,还记得班上两个刻薄的同学模仿他的乡音说“恶毒攻击”一类字眼的口气。我曾见到过他在“革命小将”的围观哄笑中被勒令跳“忠字舞”的场面;也能记起他和我们一道在京郊平谷县山区远离村庄的田地里干活时,因尿频而受窘,被“小将”们嘲笑的情景;他与另一位老先生拖着大筐在翻耕过的泥土中蹒跚的样子,还依稀如在眼前。为了这段历史,我在“文革”后报考他的研究生时,着实惴惴不安了一阵子。我虽然未曾有幸跻身“小将”之列,但与先生,毕竟“处势”不同,也确实不曾记得当年对他有过任何亲切的表示。重回北大后与他的相处中,偶而听他提及与我同班的某某,说:“我记得他,他是领着喊口号的。”语调轻松自然,甚至有谈到共同的熟人时的亲热。我终于明白了,他已将我所以为不堪的有些往事淡忘了。在累累伤痕中,那不过是一种轻微的擦伤而已。他承担的,是知识分子在那个疯狂